

倪其心 费振刚 胡双宝 等选注

中国古代 游 记 选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国古代游记选

倪其心 费振刚 胡双宝

顾国瑞 王春茂

选 注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泽儒

李大钧

装帧设计:宁成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游记选/倪其心等选注. -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0.1

ISBN 7-5032-1691-3

I.中… II.倪… III.游记-作品集-中国-古代 IV.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565 号

书 名:中国古代游记选

作 者:倪其心 费振刚 胡双宝 顾国瑞 王春茂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九号 邮编 100005)

印 刷:河北遵化市印刷厂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22

字 数:660 千

印 数:1-5100 册

定 价:40.00 元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65201174)

前 言

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过程中，独立的完整的游记散文是比较晚出的。

先秦两汉是我国古代散文发达、成就辉煌的时代。先秦诸子、两汉政论和《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传，都有许多优秀的典范的散文作品。但是，这个时代并没有留下可以称为“游记散文”的作品。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小品文字：

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有蛇焉，名曰“肥螭”，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山海经·西山经》）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

前者大概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描述西岳华山的文字，虽然它有着神话的色彩。后者可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抒写春游的精彩片段，虽然它是孔子的学生曾皙的一种志趣。也许可以把它剪裁出来成为一则山水小品，视为古代游记散文的某种萌芽状态的作品。但它们毕竟不是独立的、完整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生动的描述：

到天关，自以已至也。问道中人，言尚十余里。其道旁山胁大者广八九尺，狭者五六尺。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若在云中。俯视溪谷，碌碌不可见丈尺。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突辽如从穴中视天窗矣，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纒



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掖，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所谓磨胸捏石弔天之难也。（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

这大概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记述攀登东岳泰山的文字，但却不是独立的完整的游记散文，而是记录皇帝登泰山祭天礼仪的著述中的一节。诸如此类，在先秦两汉的散文著作中还可以列举。这种现象表明，先秦两汉没有游记散文，但这并非当时作者没有写作这类散文的能力，而是由于他们不写这类作品。

从先秦到两汉，人们对大自然山水的认识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九州山水是人类生活的物质资源，具有社会经济作用，十分重视，因此产生了《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这类重要的地理文献著作。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思想上、精神上，大自然山水是神隲的化身、君子的寄托，是思想统治、道德教化的象征物，具有超经济的约束作用。众所周知，在远古时代，日月山川都是神。到唐尧、虞舜、夏、商、周代，九州的名山大川、五岳四渎，都是天帝神隲的所在。新年开岁，帝王既祭上帝，便“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尚书·舜典》）。此外还有巡视四方，登五岳，祭五帝的仪礼制度。相沿而到秦皇、汉武，都曾登泰山，行封禅，祭祀天地神隲。正由于山水自然的神化，产生了《山海经》这样神怪而荒诞的山川记述，也留下了《封禅仪记》这种登山探路的工作记录。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的活跃的思想探索中，大自然山水渐渐人化，变成了文质彬彬的仁人君子品德的寄托。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有一次，“孔子观于东流之水”。他的学生子贡问他：“君子之所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说：“夫水大，遍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混混乎不殄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

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罔，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大自然的流水在孔子的心目中，具备君子一切美好的品德。因此，当他的学生曾皙表示自己的志趣，乐于“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便欣然赞同，誉为知礼。这样，在先秦时代，大自然山水虽然由神隲而为君子，却始终保持着神秘的、尊严的、崇高的品格特性，令人敬畏爱慕，而不视为游乐的对象，不描摹山水的自然形态。因而不仅散文中没有山水游记，而且《诗经》也只有用作比兴的山水诗句，没有山水诗。

但是，在战国末到两汉的诗歌辞赋的创作里，有山水的形象的描绘。在屈原的《九歌》中，山水自然被赋以神奇美妙的形象，用来渲染烘托诗中主人公的抒情形象。宋玉《高唐神女赋》中的巫山神女，便是巫山云雨的绚丽迷人的形象。淮南小山《招隐士》里的阴森可怖的山中节物描绘，更是用作招唤公子归来的反面手段。而枚乘《七发》中“曲江观涛”的描述，司马相如《上林赋》中铺张的地理物产的形容，也都显示着山水自然进入了文学创作。但是，在这时期的散文作品中，以山水自然为抒情手段或描写对象的文字，仍然罕见。这种现象显然表明，在先秦两汉的文化观念里，诗歌韵文与散文的功用不同，有着相应的分工。这就是，以《诗经》为经典代表的诗歌韵文，主要用于述志抒情，与音乐舞蹈相结合，属于今天所谓文学艺术范畴。以《尚书》为经典代表的散文，主要用于记事论理，只用语言文字作手段，属于今天所谓社会科学范畴。因此，在汉代人的观念里，《楚辞》是《诗经》的变体，汉赋是《诗经》的支流，而先秦诸子、历史传记、两汉政论等散文著述，都归源于《尚书》。简捷地说，诗歌韵文属于语言艺术，散文则属于应用文章。由此可见，先秦两汉作者不写游记散文，既有社会思想的原因，更有文学观念的

原因。

从汉末建安时期开始，到魏晋南北朝，相当完整的骈文游记出现了，但是独立的完整的散文游记却仍未出现。主要原因在于文学观念和文学语言的发展上。这是一个诗赋骈文兴盛的时代，散文显得格外沉寂。

在这个时代，随着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变动，儒家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动摇，异端思想源源而出，老庄思想格外活跃，大自然山水在人们思想上精神上所具有的那种神秘、尊严、崇高的品格特性和那种统治、教化的象征物的约束作用，也渐渐削弱而至于消失。高于人们之上的大自然山水，渐渐变成人们憩息的场所，游赏的对象，抒情的凭借，吟咏的题材，并且日益成为政治态度和生活道路的一种表现方式，日益具有阶级社会的具体人物的性格面貌。在建安时期，我们看到了古代较早较完整的一首山水诗，就是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大海的气势表现着曹操自己的胸襟，大海具有这位叱咤风云、吞吐日月的一代豪杰的性格特征。还可以看到王粲的《登楼赋》，湖北江南的风物景象，触发这位中原有志青年的一腔慷慨，山水平原是他的抒情手段，表现着志士不遇的情怀。在魏晋之际，可以看到嵇康诗歌里那种领略山水乐趣的自得情景：“流矰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赠秀才入军》之十四）也可以看到赵至骈文里那种悲愤不遇、山川凄怆的失志情景：“寻历曲阻，则沈思纡结；乘高远眺，则山川悠隔。或乃回狂厉，白日寝光；崎岖交错，陵纡相望。徘徊九皋之内，慷慨重阜之颠，进无所依，退无所据。”（《与嵇茂齐书》）山水自然随着人们的遭际境遇而变化着它们的精神面貌。显然，从人们接受大自然山水的思想统治、精神教化，变为人们按照自己的思想感情来认识、领略大自然山水，反过来使大自然山水具有相应的精神面貌，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事实上，从汉末建安时期到魏晋之际，在诗赋中已经相当

多地写作山水自然题材。换句话说，作为山水游记的内容，虽然还没有以散文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诗赋创作中已经有了相当的表现。

两晋从一统天下到苟安江东，门阀统治巩固，政治混乱，玄谈风行，名士优游岁月，恣情山水。寒门庶族压抑不平，清高不苟，隐逸山林。于是山水自然既披名士风流，又有隐士品格。一方面在门阀文士诗赋中充斥玄理说教的苍白文字；同时也听到了“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之五）、“山水有清音，何必丝与竹”（左思《招隐》）的寒士不平，山水成为对抗门阀的一种依据和标志。而木华《海赋》和郭璞《江赋》更使长江大海得到气势壮阔、形象瑰丽的表现，充分显示着大自然山水成为歌咏的主题。到东晋，玄谈和佛理结合，名士和高僧合流，山水和寺庙一体，自然和空门同归。于是我们看到了庐山诸道人《石门诗序》那样富有玄佛气味、结构相当完整的骈文游记，还可以看到著名玄言文学家孙绰自诩为“掷地作金石声”的《游天台山赋》。前者是亲临其地的实游，后者是观图神往的卧游。这一实一虚，一序一赋，显然不属散文游记。但是，如果从主题和结构来看，它们实质上是“游记”作品。这就是说，山水主题的文学创作，辞赋骈文的游记作品，在东晋已经正式出现，虽然它们蒙着玄佛的迷雾，带着格律的束缚，山水自然的形象显得苍白。但是，产生的条件既经具备，山水主题的文学创作便蓬勃发展起来。



南朝四代，政治上寒庶地主有所抬头，门阀统治开始衰落；文学上“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诗赋骈文兴盛。由于这两方面的缘故，使诗赋骈文作品的山水主题空前活跃。王谢大家因为政治上受到打击而愤愤遨游山水，于是“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我们看到了谢灵运大量创作山水诗，开拓了诗歌史上一片新的领域。寒门庶族急切要求



政治上改变压抑地位，于是“饥鹰独出，奇矫无前”（敖陶孙《诗评》），我们看到了鲍照的《芜城赋》、《登大雷岸与妹书》这样的山水辞赋骈文。而当晋、宋易代的政治动荡渐趋平静，新、旧门阀习惯于频繁而混乱的政变，仍旧安于半壁江山的苟安，于是隐士和寒士在山水骈文中突出起来，我们看到了“山中宰相”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和失志俊才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除了诗歌辞赋，南朝山水骈文以书信的形式为多，成就也最为突出。不论长篇巨制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还是短小精致的《答谢中书书》、《与宋元思书》，作者们都在描述山水中镕铸着自己人生仕途中的体验，表现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侧面。它们的手法、技巧也都汲取了诗歌辞赋的艺术经验。实质上，这些都是书信体的骈文“游记”。可见从南朝人的文学观念看，“游记”已经涌现。只是今天称为“游记”的散文作品则尚未独立出现。

魏、晋以后，属于学术性质的地理著述，除记载山川物产外，多述人物古迹、风土习俗，其中颇多生动描述，文笔优美。这类著述不属文学，所以都用散文。可惜南朝这类著述都已散佚。从残存片段，可见其一斑。例如《水经注》引述的下述两则：

江水又东径西陵峡。《宜都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象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冷冷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江山注》）

浦阳江又东北径始宁县嵒山之成功峤。峤壁立临江，欹路峻狭，不得并行。行者牵木稍进，不敢俯视。峤西有山，孤峰特上，飞禽罕至。尝有采药者，沿山见通溪，寻上于山顶。树下有十二方石，地甚光洁。

还复更寻，遂迷前路，言诸仙之所憩宴，故以“坛宴”名山。峤北有嵎浦。浦口有庙，庙甚灵验。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若相侵窃，必为蛇虎所伤。北则嵎山与嵎山接。二山虽曰异县，而峰岭相连。其间倾洞怀烟，泉溪引雾，吹畦风馨，触岫延赏。是以王元琳谓之“神明境”。事备谢康乐《山居记》。（《浙江水注》）

酈道元谓《宜都记》为西晋袁山松所著（按，《新唐书·文艺志》载录为李氏《宜都山川记》）。“谢康乐”即谓山水诗人谢灵运，其《山居记》已佚。这类文字虽可视为游记小品，而在当时却是应用文字。这种现象又可在其它应用文字中看到。例如谢灵运有《山居赋》，并自己作注加以说明，而其注文也有近似游记的片段。试读下引一段：

南山，是开创卜居之处也。从江楼步路，跨越山岭，绵亘田野；或升或降，当三里许。途路所经见也，则乔木茂竹，缘畛弥阜，横波疏石，侧道飞流，以为寓目之美观。及至所居之处，自西山开道，迄于东山，二里有余。南悉连岭叠障，青翠相接，云霄烟路，殆无倪际。从径入谷，凡有三口……。缘路初入，行于竹径，半路阔，以竹渠涧。既入，东南傍山渠展转，幽奇异处，同美路北。东西路因山为障。正北狭处，践湖为池。南山相对，皆有崖岩。东北枕壑，下则清川如境，倾柯盘石，被隩映渚。西岩常林，去潭可二十丈许。葺基构宇，在岩林之中。水卫石阶，开窗对山；仰眺层峰，俯镜浚壑。去岩半岭，复得一楼。回望周眺，既得远趣；还顾西馆，望对窗户。缘崖下者，密竹蒙径，从北直南，悉是竹园，东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峰，南眺远岭，四山周回，溪涧交过。水石林竹之美，岩岫嶮曲之好，备尽之矣。

记叙浙东山林庄园的建筑，写景优美，情趣盎然。它虽是注释文字，而骈散间杂，清丽可玩。谢灵运又有《游名山志》（今佚），则纯属散文，其残文如：

破石溪南二百余里，又有石帆。修广与破石等度，质色亦同。传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为石帆，故名彼为“石帆”，此名“破石”。

比较起来，它的应用文字性质更为明显。上述情况也可表明，两晋南北朝虽然已成熟地涌现出骈文“游记”，但散文中却没有独立的完整的游记作品，主要原因已非社会思想上的山水自然观的作用，而是由于文学观念上不以散文为文学艺术，不认为散文语言是文学语言。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北朝的两种散文巨著，郦道元《水经注》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其中许多记述山水名胜、风土人情的精彩篇章，历来读作游记散文，实则都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地理人文的专著。当然，应当看到南北朝上述地理著述中许多富有文学价值的片段，对于后来游记散文的成熟出现，也是肥沃的艺术土壤，提供了艺术滋养，其作用和影响是深远的。

总之，魏晋南北朝中，山水自然已渐渐失去对人们的思想约束作用，正如谢灵运所说：“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游名山志序》）山水自然只是人们按照自己性情兴趣来游赏憩息的对象和环境，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中抒情述志的手段和方式。而由于当时的文学观念，因而艺术地表现山水主题，主要用诗赋骈文，不用散文。这就是说，独立的、完整的游记散文作品的产生，关键在于文学观念、文学语言上的一种转变，就是需要以散文取代骈文的文风改革。

隋代到唐玄宗开元盛世，文风大体沿袭南朝，仍旧盛

行骈文。一方面在山水宴游中，文人士大夫往往以咏诗为主，用骈文作序以说明宴游时地及感慨，其名篇如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在书信中，以山水主题来寄概述意，仍不乏佳作，其名篇如盛唐王维的《山中与秀才裴迪书》。另一方面，在应用的专著中，仍可读到精彩的山水记述片段，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即是用散文记述西行求经的旅途经历观感，颇有具体生动的描写。这种情况显然与南北朝一脉相承。到唐玄宗天宝年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从封建阶级下层渐渐出现一股以复古求改革的思潮，思想上要求遵循儒家思想传统，文学上主张运用“古文”，即以先秦诸子为典范的散文和散文语言。在天宝末，安禄山叛乱暴发以后，由于战乱现实表现政治改革的亟须，因而这一复古思潮的影响渐渐扩大。到唐肃宗、代宗朝，这一思潮的代表作家之一元结，用古文即散文写作了许多山水主题的铭文题记，实际上已开游记散文的先河。因而他在文学史上既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又是游记散文的始作者。元结的游记散文，一方面显示着文风的改革，同时又表现出过渡的痕迹。从内容看，他的游记散文大都是借山水以抒感慨，以发议论，具有较高的现实性和政治性，是从改革出发的。例如《右溪记》记叙发现、兴修道州城西附近一条无名小溪，而主题思想则在议论朝廷用人不当，感慨名位和才用不符。文中明确写道：“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所以前人评论其文，“大约抗节励志，不可规随。读其书，可以想见其人”（章学诚《元次山集书后》）。从形式看，他的游记散文大多为铭序，以四言韵文的铭为主，小序为说明作铭情由，所以十分精短，但也表明这类游记散文其实尚未完全独立，不免拘于传统文学观念和习惯。

完整的游记散文的独立出现，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到唐宪宗元和年间，是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一项成果。



安、史乱后，大唐帝国从鼎盛转向衰落，封建制度也从颠峰走向下坡。宦官擅权，军阀割据，东北为安、史余党控制，西北吐蕃、回纥势力强大。朝政混乱，姑息妥协。到唐德宗贞元年间，朝野改革要求强烈。这种政治形势下，韩愈以复古求改革的“古文运动”应运而生。他努力复兴儒学，鼓吹道统，排斥老庄思想、道教、佛教的异端，提倡以先秦两汉散文为典范的“古文”，反对讲究声韵对偶、堆砌词藻典故的骈文，从思想上文化上为巩固大唐统一、维护封建统治而谋求改革。柳宗元则注重实际的政治改革，积极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激进的改革斗争。他与韩愈的政见并不一致，但根本目的相同。因此在改革失败，遭遇挫折之后，他也用古文从事著述。在倡导古文、反对骈文上，他与韩愈一起作出重大贡献。从唐代活的语言中提炼出新的书面散文语言，用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取代了日趋僵化的骈文语言和空洞浮华的骈文作品，从而使散文从应用范围进入文学领域，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解决了关键的散文的文学语言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改革思潮的浪涛中，独立的完整的游记散文的涌现，恰同六朝游记骈文的出现形成对照，带着改革的生气，冲破骈文的束缚，山水自然的形象显得充实有力。这是时代的使然，因而也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爱国壮志的追求和遭际不遇的悲慨，是这时涌现的游记散文在思想内容上的共同特点。作者游记散文，而其《燕喜亭记》为早年贬官阳山时的作品，《记宜城驿》为晚年谪迁潮州途中的产物。前者写替友人筑亭取名的事由，以寄不遇感慨，以励志节操守。后者叙述宜城驿、楚昭王庙的沿革和习俗，抒发国家衰落、军阀割据的悲慨。大诗人白居易在元和以后也颇有游记作品。其《草堂记》作于贬官江州司马期间，以正面记叙筑室庐山、归隐山林的志趣，反衬厌恶混乱政治于言外。《三游洞序》是在江州司马调任忠州刺史途中产物，记述作者兄弟巧遇元稹，同游三

游洞的过程，借这一胜境处于交通要道而长期不为人知的遭际，抒泄怀才不遇的感慨。而最足以代表这时期游记散文成就的作家，是柳宗元。

柳宗元的游记散文都是在元和间贬谪永州、柳州的十四年中写作的，具有高度的思想性、现实性和政治性，鲜明地表现出他身处逆境而壮怀不懈的爱国志士的思想性格，形成雄健雅深的独特风格。而在艺术上则继承发展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融会诗歌的比兴、史笔的褒贬、寓言的讽谕、政论的犀利，又汲取辞赋骈文描写山水的艺术经验，使游记散文的文学价值空前提高，奇葩盛开，芳馨永播。他的《愚溪诗序》记叙构筑冉溪宅园和以“愚”命名的情由，原是说明写作《八愚诗》的序文，因而有诗序的一般结构，但精心构思，精当剪裁，取法寓言，抒泄孤愤，讽刺世俗，确为山水主题散文中别开生面之作。《游黄溪记》允称完整的游记作品，写景如绘，状貌可见，清丽省净，而叙述传闻，议论隐沦，委婉深微。最代表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成就和特点的是“永州八记”。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其实总结了两种游玩山水的态度和体会，生动而深刻地说明在身处逆境时应当坚持崇高理想，胸怀开阔，目光远大，从思想上解除挫折忧烦的束缚，不应生活闲散，逃避现实，追求一时的自我麻醉。它有浓厚的抒情性、高度的哲理性和美妙的象征性。《钴姆潭西小丘记》在记叙小丘的遭际中，寄托了下层才俊的压抑愤懑。它赋小丘以生气勃发的形象，用史笔写小丘弃置不遇的境况，以拟人的诗情写小丘购得致用的惬意，发明快的议论来阐述小丘前后遭际的政治涵义。《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小品游记的杰作。在幽隔澄净的小石潭景物描写中，显示出坦荡磊落的清高君子的胸襟情怀；而在探望源头的回顾中，寄托着志士仁者离群索居的凄怆感慨；作者终于“以其境过清，不可久留”，离开了小石潭，正意味着作者的志士胸怀，在进取和退隐的抉择中，不能超脱现实，不甘清高隐逸。总之，





柳宗元山水游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开创了游记散文以山水抒写政治感怀的一种优良传统，影响深远，直至于今。他的“永州八记”已经完全不附属于诗赋韵文，表明游记散文作为文学作品而独立发展起来。因此，在古代游记散文的发展过程中，柳宗元“永州八记”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

从元结到柳宗元，是古代游记散文独立开创的阶段。如果从今天称为“游记”的观点看，事实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以山水为主题的题记散文，是作者们各自仕途宦游中观赞山水、凭吊古迹以及修筑园林，兴办德政的各种题名作记文章。因此，在这一时期，既可看到散文游记，也可看到骈文游记，其名篇如韩愈的同榜及第的朋友冯宿的《兰谿县灵隐寺东峰新亭记》，便是游东峰亭，赞亭主，美德政的题记骈文。同时还可看到游记散文相当活跃，形式上也有所创造。例如韩愈的门生李翱的《来南录》，便是古代最早的一个旅游日记，简略而不无描述地记录了从今陕西西安市到今广东广州市的旅行，行程长达数千里，经过今陕西、河南、江苏、浙江、江西、广西六省，历时半年。它有实录地理著述的文献价值，也有相当文学价值，开创了古代游记散文的一种体裁，宋元以后继续发展，日趋完备，多所采用，颇有佳作。

宋代是古代游记散文巩固、发展阶段，成就突出，贡献巨大。北宋立国，先天不足，国力衰弱，基础未稳。外有辽国，内有割据，兼并剧烈，民怨沸腾。因此开国初期即发生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尖锐；辽和西夏强大，民族矛盾突出；在封建阶级内部，则忧国的激愤，改革的思潮，迸发涌起，到宋仁宗、神宗朝，便先后出现范仲淹改革和王安石变法，从温和到激进，愈演愈烈，引起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尖锐，形成以王安石变法为界的新旧党争。这种形势下，北宋散文一开始就直接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传统，以散文为政治改革的武器和工具，发起

文学革新，反对“西断体”的形式主义。而游记散文也成为抒情述志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因此，仿佛历史的重演，我们看到北宋游记散文的优秀作品大多是作者们政治挫折、仕途贬谪生涯的产物。但由于北宋中叶的政治现实比中唐更为腐败，封建制度益发衰落，因此作者们以山水主题抒发的政治感慨和思想情绪更接近柳宗元，但孤愤渐淡，清高趋浓，山水的形象日益突出，游记的特色更加显著。苏舜钦《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是作者遭诬撤职期间所作，原为应请而作的水月寺的题记，但他却把它写成一篇追忆昔游的游记，借以抒泄心中抑郁，而寄托清高超脱情怀。欧阳修《醉翁亭记》作于贬官滁州期间，也是为琅邪寺的一座亭子而作的题记，但作者借山水以寄慨，寄托与民同乐的仁侧，蕴藉太平逸豫的忧虑。苏轼、苏辙兄弟的游记名篇大多是在“乌台诗案”后分别贬谪黄州、筠州期间的作品。苏轼《后赤壁赋》中写夜游赤壁，既生动如实地描述赋闲自在的黄州生活情景，又用象征手法形容独自攀登赤壁的奋勇无畏而震恐的过程，再以奇幻的遇鹤梦鹤结束，显然寄托着他政治遭遇的孤愤，而终于只能用超脱自适来解决矛盾，排遣苦闷。正如他在《志林·记承天夜游》中描述月夜散步庭院后的感慨所说：“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理解、欣赏月的清明、松柏的高洁的人，却是间暇无可作为的人。苏辙《武昌九曲亭记》更借记述苏轼修筑九曲亭的情由，直截议论苏轼“以适意为悦”的思想，明确指出其实质是“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不仅是苏辙对他哥哥清高超脱思想倾向的一种确切阐明，也有助于了解北宋游记散文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特点。

北宋游记散文在思想内容上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是抒写一种注重实际的进取精神。比较起来，这类作品却是更为完整的游记。作者们当时处境一般比较顺利，或者有所转机，思想情绪比较开朗乐观。因而这类作品大多是





名副其实地记游，以记述山水名胜、文物古迹为主，描写比较生动活泼。只是他们的游后感触则往往属于“百闻不如一见”，发挥求实和进取的议论。有的议论比较一般；有的则是立意于议论，构思更为完整。柳开《游天平山记》生动记述游赏故乡名山的过程，而游览原因却是由于认为和尚惟深夸奖天平山是为了讨好自己，而结果证明“惟深之言不妄”。谢绛《游嵩山寄梅殿丞书》是因作者游嵩山之前，他的妹夫梅尧臣曾先游嵩山，并且有所评论，而作者游嵩山时看到梅尧臣的题记，也产生一些不同观感，因此兴致勃勃地写了这封信告诉梅尧臣。曾巩早年所作的《游信州玉山小岩记》以丰富的想像描述了游览玉山岩洞的奇丽景象，而在说明写作此文原由时，则发感慨说，“呜呼，自古述山水者多矣”，但是有的把山水美“委之神明”，“怪诞迂谬”；有的更弄神弄鬼，“羁于流俗”；他都不取。他是“实其事为记”的。至于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和苏轼《石钟山记》，都是脍炙人口的以山水说理的游记名篇。前者借深入华山后洞游览的体会，发挥学习、立业必须坚持不懈、知难愈进的道理；后者借夜游石钟山的实地考察，说明“凡事都不可臆断”的道理。它们都是开创游记说理一体的典范作品。

北宋游记散文一般都短小精悍，平易流畅。由于多用以抒情寄慨，因而作者多熔取诗赋创作的艺术经验，用心立意，追求境界，个性突出，风格各异，而手法灵活，形式多样，勇于探索，富于创新。《醉翁亭记》、《黄州快哉亭记》之类题记型的游记散文，或构成深远意境，耐人寻味；或重在议论，发人思索；都显出作者自我形象，表现独特风格，突破题记的俗套。《游褒禅山记》和《石钟山记》都是说理性游记，但并不脱离山水形象，而且结构、手法各有特点。前者以游洞为譬喻，立意于理，情从理出；后者对声响作描述，情重于理，理从情出。《游嵩山寄梅殿丞书》显然保存六朝以来书信体游记的形式，而又有日记体